

关于词语“铁人”的文化阐释

隋琳

(大庆师范学院 学科建设办公室,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摘要]“铁人”不仅是拼搏奉献的大庆石油工人的代表,同时也固化成一种文化符号。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符号的流转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从而产生了同一能指“铁人”下的不同所指,进而逐渐成为大庆地域文化史的构成要素。对“铁人”这一关键词内涵的由来、衍生、符号化以及它的价值拓展的文化阐释和溯源性考察,可以使阅史者观照出大庆这座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透视铁人精神、铁人文化的丰富性。

[关键词] 铁人;地域文化;大庆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0)03-0092-05

说到“铁人”,人们都会自然地联想到拼搏奉献的大庆石油工人的代表、“宁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事实上,王进喜并不单纯是一位有价值的工人,从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早已形成一种符号性的文化特质与精神财富,为后代所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符号的流转又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从而产生了同一能指“铁人”下的不同所指,进而逐渐成为大庆地域文化史的构成要素。

从1960年开始的大庆“石油大会战”这一深具军事意义的命名中,可以体察出国家对石油开发的迫切性。事实上,以余秋里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完成这项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意志并不亚于对待一场战争的态度。显然,这种政治和军事背景的大庆“石油大会战”从命名伊始,就已预示着其中所能产生的“会战英雄”必是来自石油勘探开发领域。即便是在军事会战结束后,它所能体现出的军事思维,仍能持续一种接续前因的后革命叙事。

1963年,当周恩来宣布中国石油基本自给时,这就等于宣告大庆油田在国家石油战略中的地位已经超越了一座资源型城市与其规模所能匹配的价值。这同时也在国家层面上暗示了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英雄,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地域性的模范人物,而应该是一种具有国家身份和民族意义的文

化符号。

一、“铁人”的由来

按孙宝范和卢泽洲的《铁人传》记载,虽然王进喜在少年时期即进入钻井队工作,但他作为钻工,真正开始钻井生涯还是从1950年春参加玉门油矿的招工后开始的。此时王进喜27岁,在扫盲班开始学文化,同时,他还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学习钻井知识。从1950年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郭孟和、梁文德钻井队当钻工。工人们总结的这个时期王进喜的特点主要是:品德好、能吃苦、有组织能力、工作积极上进,他也因此受到了工友们的尊敬。

1955年,由于王进喜在工作中的积极表现和优良品德,他被纳入干部培养计划。1956年,王进喜被党组织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被提升为贝乌5队队长。1956年11月23日,玉门三角湾765井井场的钻台整体搬家工作的创新,是使王进喜轰动整个玉门油田的大事,也正因为这件事,王进喜第一次受到玉门油田的关注。王进喜在玉门油田第二次受到关注是1958年,在当时一般钻井队月进五六百米、七八百米已算正常的情况下,他率领的钻井队实现了月进5009米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一成绩在当时激发了其他钻井队的工作热情。^[1]显然,王进喜在玉门油田时,即已因成绩卓著成为受人瞩

[收稿日期] 2010-03-1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514149)

[作者简介] 隋琳(196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大庆师范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教授,从事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目的钻井队长。而且,在王进喜的各种轶闻中,最突出的仍旧是他干工作的冲劲和在这种团队协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人领袖气质。

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行和才能,使王进喜能够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工人领袖——他出身低微,曾是受剥削的劳动者,在新的国家体系中表现出忘我的工作热情并切实创造出非凡的成绩,因而赢得群众尊重,这些特征决定了这个人物成为了石油工人的典型。

1960年,王进喜带领1262钻井队(即今1205钻井队)离开玉门到大庆油田支援“石油大会战”。王进喜到大庆油田后延续他在玉门的工作作风——勤奋、刻苦,无论是人拉肩扛运钻机,还是跳泥浆池,他都身先士卒,让钻工和群众深受感动,被称为“铁人”。1960年4月11日,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在安达召开的油田技术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向“铁人”学习的号召,4月13日,大庆油田内部报刊《战报》在总第2期上发表会议通讯《余部长号召全面开展“六大运动”——学习“铁人”王进喜 人人作“铁人”》和第三探区指挥部指挥宋振明的文章《“铁人”王进喜是我们劳动和生活中的一面红旗》,这两篇文章第一次以指导性文章的形式在全油田范围内对王进喜进行公开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是大跃进运动的后期,无论是英雄崇拜还是工农业生产,都处于一种超常的释放中。大规模的广场狂欢成为这种情绪释放的表征。例如,1960年7月1日的“万人大会”,这次广场动员所要宣传的是在油田单位号召人人作“铁人”后出现的“五面红旗”,这是一种放大的“铁人”精神,也是在此时创造“铁人”精神的最新范本。在当时简陋的生产条件下,这种以精神力量加速油田开发的方法,是实现石油梦想的最好助推剂。同时,为激发普通群众的工作热情,大庆油田还在各单位举行总结评功会,通过讲摆成绩的方式发现先进人物,带动后进人物。这种工作方式很好地推动了一批先进人物的出现,包括最讲认真的人周占鳌、学铁人带头人屈清华等。可以说,王进喜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起到了一个政治引导员的作用,他很好地带动了其他干部、工人在石油会战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此时,大庆油田的成功开发,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石油自给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问题。于是,王进喜等大庆工人的行为就不仅是一个油田的行为,而是一种

国家行为。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木、范荣康的文章《大庆精神大庆人》,之后,大庆经验被写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一时期,大庆油田及石油工人也开始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大庆本地的工人、家属,还是全国知名的文艺工作者,都开始注意到在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故事所具有的文艺价值。此时关于大庆会战的文艺创作在内容上呈现多元化,无论是工人居住的干打垒,还是石油工人豪迈的建设情怀,都在此时期创作的诗歌中有所体现。现在流传下来的《干打垒之歌》、《采油姑娘之歌》、《我为祖国献石油》等都是当时精神生活的写照。尤其是1964年剧作家孙维世到大庆体验生活后于1965年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把大庆油田及“铁人”以艺术形式推向了全国,使“铁人”开始进入文化层面,具有文化要素。这部话剧的创作显现了两种时代精神的汇合,一种是民族叙事中的“革命”主题,另一种是石油开采中的“会战”主题,虽然在这部戏中,通过人物之口对这两个主题各有阐释,但整部戏更像是对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承进行生活情境化的铺展。“革命”是革命,“会战”也是革命。从始至终,“革命”都没有真正离开我们,在这种主题暗示下的英雄人物,当然也是“革命”的英雄。这样,剧中的王铁人作为“会战”的英雄,也就有了承袭历史主旋律、点化历史主方向的义务。事实上,选择生活场景中的英雄,也是一种反殖民体系的文化配合,它使一种反殖民的话语体系暂别剧烈冲突的敌我战场,而在积蓄民间力量的日常生活中,以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现,来政治化地反映这种力量在民间取舍中的整体指向。从整体上看,这部戏虽然也有概念化的缺陷,但它的政治温度仍是适宜的。

二、“铁人”的衍生

王进喜1970年11月15日夜里在北京301医院去世。在他去世8分钟后,周恩来赶到医院送别,并指示做好王进喜的纪念宣传工作。从王进喜去世到1990年,是“铁人”这一称谓的文化形成期和不断衍生期。这个时期,“铁人”作为一个词语,主要特征仍是继续维系它的工业价值和政治价值,同时伴以刚刚出现的文化价值和资本价值。

1971年7月1日,“铁人王进喜同志英雄事迹陈列室”在大庆王进喜打的第一口油井旁建成。这是大庆油田又一次以历史视角,主动地以“铁人”的名义介入文化史的事件。只是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当然更是由于去古未远,这个陈列室直至80年代末仍是较为低调的。但它为后来承建更大规模的

纪念馆打下了基础。这也如同“铁人”在这个时期的词语性要求,此时的“铁人”更像是一个注解性的词汇,它在这个时期的主词是“大庆”,国家提倡的是“大庆经验”、“大庆式”的企业,应该肯定的是“大庆精神”。“铁人”作为一个词语和王进喜作为一名工业英雄的形象,虽然仍能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前提却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事实上,无论怎样肯定王进喜,他的前提形象仍然是石油工人的形象,或者这也可以说是他的唯一形象。

从艺术作品来看,这时期的“铁人”是仍按其本体受到不断书写的石油人。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铁人”形象是1975年的电影《创业》中的主人公和原计划1976年发行的贰元人民币上的主图,这种安排,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铁人”仍是有所特指的,它的政治意义也仍持续于一种阐发着的文化效应之中,而且对这种文化效应的解读,也包含在政治性的摇摆中。相对上一个时期的《初升的太阳》,电影《创业》受到的政治纠缠更为复杂,虽然在表现上,它仍然没有脱离“铁人”的意义本体,但其作为一部相对更为强烈的政治电影,它的文化意义也掩盖在了政治交锋的考量中。

与政治文化政策相类似的,如果注意考察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劳动模范命名,会发现“铁人”式的命名所能体现的政治性要求和历史延续性本身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铁人”这个词语所能包含的道德力量和向先贤致敬的隐含意义,更容易在大庆油田形成一种情感共鸣。尤其对从事生产的企业,寻找石油工人中的英雄更有它的现实针对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家层面的宣传更容易认可“大庆精神”,但在大庆地域文化的认同层面上,“铁人”作为一个具象化的工人神,相对“大庆精神”对国家财富的积累,这个词更有它的属人优势。它是一个容易凝结人脉和产生认同的词汇,正如“孔子”对曲阜的地方含义和儒学对它的文化认同,“铁人”对大庆的地方含义和石油工业对它的文化认同也是有异曲同工的作用的。

1977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在大庆和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工业学大庆”号召的继续,同时也是国家工业建设方式在尚未进行根本改变前,继续以往经验的会议。其中尤有代表性的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继续强调大庆的经验,甚至希望石油部门能有10来个大庆。国家邮政局为此发行纪念邮票一套四枚。这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包括60年代工

业学大庆经验的一次总结,但同时也是一次工业经验的推广,它代表了沿袭下来的毛泽东工业建设思想在其继任者中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不从经济战略上考虑,这次工业学大庆的会议,是在国家层面上对一个政治大庆进行的最后一次隆重纪念。

在具有“铁人”标识的文化生产中,这个时期的文化产品具有了更强的本土特征。一批在大庆本地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开始创作属于大庆人记忆中的“铁人”和大庆。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戏剧家杨利民。他早期的剧本创作仍是围绕石油工人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他的作品,并不侧重于石油开发的具体工作,而是以石油工人困顿的情感生活作为叙事的主线贯穿全剧。在他的作品中,为国奉献的石油工人不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中更为被动,也更为落寞。这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杨利民1989年创作的十二场话剧《大雪地》。在这部作品中,人们所能体会到的是正在远去的英雄。“铁人”不再是一个民间立场上的主词,它已经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属性。

三、“铁人”的符号化

1990年底,“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在“铁人井”东侧建成。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它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参观者。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学生,都到此来感受“铁人”的文化意义。为了更好地宣传“铁人”精神,2006年9月26日,由温家宝题写馆名异地新建的“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正式开馆。在这20年中,创业故事、铁人故事在各种媒介中复演,但“铁人”不再是一个禁锢性的词语,而是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转变成一个富含联想意义的词语。

“铁人”一词到了20世纪90年代被演绎成“新时期铁人”。1996年8月27日,中共大庆油田党委做出《关于向“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学习的决定》。王启民1961年大学毕业后即来到大庆油田参加石油会战,经历过王进喜的铁人时代。他的主要贡献是,克服种种困难,依靠科学技术,为大庆油田持续稳产5000万吨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当时条件简陋,技术水平低,加之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便被凸现出来,科学技术的因素被覆盖。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20世纪90年代,仅仅靠一身力气已经远远不够了,国家的科技政策已经替代了民族革命思维在国家战略上的支配地位,形成了这个时代新的文化方向。而这个文化方向又并非如上一个时期对历史和前现代

生活的文化方向,而是一种面对现代世界的变化所做出的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方向。

现代性的方向,并非发生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它也同样发生在资本领域和消费领域。在这一时期,“铁人”不仅是作为英雄的特定称谓,同时也开始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被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铁人”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最为著名的工人之一,在国家体系中已经成为具有潜在权力话语特征的知性符号,在市场条件下对此类话语的运用,不仅具有政治优越性,也同时具有对前权力体系的文化解构特征。在当时的氛围中,这种似乎双赢的文化策略和市场政策在极短时期内迅速发展,从一个个企业到一件件消费品,从一个个媒体到一个个团体,“铁人”或者与“铁人”相关的词汇迅速进入各种文化群落之中。由资本力量带动的泛文化的“铁人”已经超越了艺术工作者所能制作的文化范畴,这个时期的“铁人”已作为一种重复叙事而被演化进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它的泛文化化应用一方面证明了词汇本身的所指特征,即是说在普遍的认识中,认为“铁人”必将包含一种承传父辈的价值优势和力量;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个词汇所能包容的能指意义,即是说在不同的现实借用中,支撑起这个词语多重嫁接的泛文化价值,在这种种的词语嫁接中,作为某种单一价值内涵的“铁人”已经无法解读更为丰富的社会群落定义,尽管在一种既定的可能中它仍然存在一个基本的词汇意义,但在日益成形的消费社会中,各种无深度的、解构性的文化活动却又必将把这种前政治性的词汇带入另一种民间狂欢之中,与此同时,顺其自然的遗忘与强迫性的集体记忆又可能抽空其中的文化内质,最终将它变成一个词义相对容易认定的浅词语,回到它所应依附的时代。

尽管有这种泛文化化的“铁人”变迁,文艺创作中的“铁人”仍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声音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得以维系。本土戏剧家杨利民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两部比较重要的作品,分别是1996年的《地质师》和2005年的《铁人轶事》。这两部戏在现实人物的选取角度上要高于杨利民早期的创作,他不再选取普通的石油工人作为表现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尽管作家尽量去表现英雄的儿女情、平常心,但这两部戏的政治指向仍是显见的。尤其是《铁人轶事》,虽然其中的场景是一个个恍如隔世的会战传奇,但其历史化的目的已经非常强烈地表达在这部戏的主要情节中,这是一个平民时代的英雄记忆,虽然它已经变成我们的创世

神话。

四、“铁人”价值的拓展

相对于文化和消费领域的词语运用,石油单位的“铁人”仍要保有它的企业价值,才能在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中继续履行责任。事实上,“铁人”这个词在诞生后,已经分化出民间、企业和政府等多个领域的意义阐释,相对民间的分散力量,国家和企业的阐释成为其中的主要阐释源。而国家,尤其是石油企业之所以将“铁人”塑造为中国石油行业的灵魂,最重要原因仍是“铁人”这个词所包含的管理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若要使“铁人”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当然不能仅限于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有成绩的管理者要通过这个人物以及这个词所包含的精神资源价值,挖掘出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和人员成长的有利因素,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企业管理是一切企业所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尤其对走出去的石油企业来说,按照油田生产规律,建立符合自身企业特色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仍是当前各级企业管理者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简言之,现代企业需要的企业管理内容,应当包括学习型企业、榜样型工人和实践型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能将这三者恰切联系起来的,恰恰是“铁人”王进喜,其原因是:

首先,“铁人”王进喜是自觉学习的榜样。从他的经历和当时的条件而言,“铁人”受教育较晚,但他能自觉学习文化知识,并在钻井实践中和科技人员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和创新了一系列的钻井方法,提升了钻井效率。王进喜这种学习精神对石油企业特别是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中国很多油田都在面临储油量下降、石油开采难度加大的问题,更由于中国石油资源的匮乏和海上石油资源的开发,若要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就必须要求全体企业员工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无论是前线工人和技术人员,还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投入到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中。为了加强企业工人和各级领导者的学习效力,更有必要在整个企业中建立定期学习制度,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树立整个企业的学习风气,建立学习型组织。

其次,“铁人”的成长经历告诉人们,成功的企业管理者首先应当是来自基层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企业家要成为企业的榜样,就必须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企业和企业管理来说,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延续经

验和实践的问题。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的代表,在选择企业的领导人时,不能割断与基层群众的联系,要选择那些得到群众公认、受到群众推崇的代表性人物。只有这样,企业的领导者才会成为工人所认可的领导者和楷模,企业的凝聚力才会增强,效益才会提高。

让企业领导者成为工人的楷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石油企业的生产特点。石油企业作为资源开采型的生产者,在实际工作中必然要按照石油分布的特点进行施工,这就造成了石油行业的分散布局、分散生产的工作特点。面对分散布局的石油生产单位和处于边远地带甚至跨国生产的石油工人,仅仅依靠规章制度的作用是不够的,企业的管理者还要从对企业职工的思想认同、文化认同上下功夫。就一个文化共同体而言,建立诠释意义的文化符号,才是真正联系自然人的文化属性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在石油行业受到普遍敬重和广泛认同的代表性人物——“铁人”王进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管理者,成为中国石油行业的民族英雄和文化符号,其价值毫不逊色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众多知名人物。事实上,“铁人”是一位产生自传统,并对石油行业产生新的企业传统和企业伦理都至关重要的人物。在这一点上继承“铁人”的精神财富,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只有企业的管理者自觉地成为“铁人”式的干部,广大职工学习“铁人”的热情才会被调动起来,各石油企业尤其是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生产单位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和进步。

石油行业不仅要在企业管理上学习“铁人”,在企业经营中同样需要学习“铁人”,这里涉及“铁人”的品牌经营问题。“铁人”作为一个词汇,它的语言

学泛化已经成为事实,但在这种语言泛化的内容中,仍有较为积极的品牌因素在起作用。如何保护和规范这个石油行业的标志性品牌,也是包括石油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鉴于“铁人”品牌的自然效应,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大对这个品牌的监管力度,将其纳入国家级品牌保护范畴,对在商业行为中出现的商标抢注和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出现的品牌滥用问题,要适当清理。对已经成型的商业行为,要注意规范其使用,以起到对“铁人”品牌的延伸和保护的作用,让“铁人”成为一代代石油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支柱。

最后需注意的是,石油企业面对国内日渐萎缩的石油开发市场和不断提高的石油开采能力,已经开始向国外派遣优秀的石油勘探队伍。如何在这支队伍中保持战斗力,也成为企业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外的石油工作对现在的石油人来说,仍属于创业阶段的工作,而且相对于国内的石油勘探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实践证明,只有继续坚持“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的石油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才能成为受人尊重的品牌队伍。中国的品牌钻井队,只有在与国外钻井队的比较中胜出,才会在各国采油区获得高度的认可,也才能取得可观的效益。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的机械设备确有差距,但我们的队伍依然可以依靠精神力量抢占石油勘探开发的制高点,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仍需要有一支思想统一、作风过硬的“铁人”式队伍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孙宝范,卢泽洲. 铁人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80.

[责任编辑:赵玲]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Iron Man"

SUI Lin

(Academic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fice,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 China)

Abstract: "Iron Man"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oil workers who struggled and dedicated to Daqing Oilfield, but also it has internalized into a symbol of culture. As times advance, this symbol has been endowed with different connotations. Hence come the different references of "Iron Man" under the same referential condition which gradually constitute the elements of the geological history of Daqing.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traceability research of the key word "Iron Man", such as the origin of the connotations, its derivatives, symbolization and extension of values, can help readers of history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is industrial city and perceive the cultural richness of "Iron Man" and Daqing Spirit.

Key words: Iron Man; regional culture; Daqing Spirit